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当代日本政治的 思想基础

【美】特索·纳吉塔 著 贺雷 译

社外借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当代日本政治的 思想基础

【美】特索·纳吉塔 著 贺雷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美)特索·纳吉塔著;
贺雷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0

(凤凰文库历史系列)

ISBN 978-7-214-21335-8

I. ①当… II. ①特…②贺… III. ①政治思想史—
研究—日本 IV. ①D093. 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2861 号

Japan: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by Tetsuo Najta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368

书 名 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著 者	[美]特索·纳吉塔
主 编	刘 东
译 者	贺 雷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8.75 插页 4
字 数	1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2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335-8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主 编 钱乘旦

项目总监 刘 卫

项目执行 王保顶

前 言

本书为当代日本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视角。它并非一部简明的日本史。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本书尝试向他们传达日本人在其历史、政治以及现代经验中所反映出来的复杂性和严肃性。这里提供的材料并不是新的。它们来自我过去几年的阅读以及我自己的一部分著作。正如注解中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都很容易在日本以及西方的专题文献中找到。从事日本研究的教师以及学生肯定会提供更多的素材或推荐其他的选项。希望这部著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新的讨论、进一步的研究,争论以及对文中观点的修订。

在写作类似题材的著作时,作者通常会花费很多时间来勾勒出一个主题。我的妻子艾琳娜从一开始就陪伴着我的精神之旅。这部书得以完成是和她在知识及思想上的帮助分不开的。我必须感谢那些同一研究领域的同事以及我在日本的老师和朋友。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罗切斯特大学,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问题座谈会上曾就我的写作项目的很多方面展开过讨论。在由美国人文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系列研讨会上,罗伯特·贝拉, Harry Harootunian 和埃尔文·沙伊纳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

加哥大学的会议上对本书的各章节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评述。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三谷、佐藤诚三郎、石井城、新山茂树等教授都慷慨地为我提供他们的知识。1971年夏天在东京,坂井雄吉在本书的初期筹划阶段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后来见面时他还带给我很多很有价值的启示。在芝加哥大学我讲授的课程上,我曾在报告与讨论中涉及到本书的很多章节。我非常感谢那些朋友、同事以及学生,不用说,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观点。

在最后准备手稿时,玛西卡·摩恩,帕特里克·葛莱和尾石朝子给了我非常慷慨的帮助,对此我感激不尽。

目 录

前言	1
第 1 章 导论：一个观察现代日本的视角	1
第 2 章 德川时代的官僚政治遗产	15
幕藩官僚体制	17
德川时代日本的官僚意识形态	24
第 3 章 德川时代晚期的维新主义	39
水户学	41
作为行动伦理的理想主义：王阳明和国学	46
作为反抗的忠诚	54
第 4 章 明治时代对宪政及思想信念的探索	62
政治实用主义的胜利	63
宪政政府的建立	70
明治时代的新意识形态	77
第 5 章 20 世纪初期的政治变局与抗议行动	91
宪政和意识形态	92

大正社会中的政治批评:大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 101

20 世纪的维新主义 113

第 6 章 结语:日本超越维新 122

第 1 章 导论：一个观察现代日本的视角

对于西方人来说，日本的形象有些暧昧。1 亿人被观察到生活在四个小岛上（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它们的面积加起来大体和加州差不多。这些岛屿矿产贫瘠。尽管环境如此不利，日本人还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很多人眼里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日本又兼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最不好的特征，他们了解西方法律以及宪法程序但又他们在建设国家“公司”的时候改写它们。这种观点经常出现在一些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的话语中，“我们到底打造了一个什么国家？”还有一些人则把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包括大众消费，知识多元化和极其密集（仅在东京这个半径只有 6 英里的地区就聚集了 2500 万人）的情况下实现的人口稳定等视为向后现代推进的各种证据。最后，还有一些人发现，随着日本变得与西方越来越相似，它变得不再那么容易理解了，它的特质源于依然弥漫在该国心理中的那些模糊的“封建的”或“传统的”东西。这样，我们常会想到那些散落的装着荷花和菊花的口袋，这些旧封建时代的美学象征被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一个与之相反的钢铁与电子的散乱的海洋里。¹

在这个模糊的形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复杂而且难以琢磨的现代实体，

要想理解它必须深入其内部。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强调两个主题,对政治史学家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现代日本的最基本的主轴。主题之一是官僚效率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源于“官僚主义”的传统。在该传统中,高效的、可测度的行政表现被视为实现国家福祉的核心。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题,虽然并不那么容易观察得到且更加难以捉摸,又在对官僚准则的至高无上性进行着否定。它强调一种古老的但又让人深切感受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纯洁的人的心灵(人间性,心),强调(男)人身上所拥有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忘我地创造并奉献的能力。这一价值观的一个更为现代的概念则把自己与民主价值观的至高无上性联系在一起,而民主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应该奉行的心灵与文化的准则。在当代日本,政治批判的历史是在针对官僚主义原则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抵抗中形成的。

官僚主义在当代日本的重要性显然是无可争议的。它为日本崛起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确实,没有人会否认日本在 20 世纪中期的惊人的工业化成就,这一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来说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的破坏性失败之后取得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种经济表现既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移植了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而是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纪开始之前就早已深深植根于日本自身的土壤。这种经济表现是一种在传统中积累起来的官僚管理的一部分,也是对在各种结构中有效行动的各种态度或一种复杂的反应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所有这些的全部。

不幸的是,这一传统的活力有时是被遮蔽的。日本工业体系对外的各种面貌显得很新。这些外观看上去要比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流线型也更有力量,而某些变化,比如工业产品的重点从纺织品转移到各种技术复杂的产品,则对此形象的形成起着促进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宪法的指导路线现在变成是“民主的”了,这与战前采用的路线完全相反,这个特别的要点常常被用于将日本的工业复

兴简单地归因于美国占领的副产品。

美军的占领并未给日本提供一个全新的领导或计划来实现工业复兴。它的初衷是为了看着日本人民走向民主与和平。因此，它对如下措施非常重视，如土地改革，反托拉斯立法（解散财阀）以及教育及警察权的下放。躲过轰炸的大型工业设施（只占全部的25%）计划被拆除，而来自美国的援助（5年间有大概20亿美金）则主要用于补充食品而非为工业复兴提供资本。占领军对日本未来的设想是一个民主、和平，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这一设想很清楚地体现在新宪法（在日本被视为麦克阿瑟宪法）的著名的第九条里，在该条中，日本以其主权保证永远不保留“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其他所有战争潜力”。

然而冷战迫使占领者对其理想的立场进行了修正。它开始着重依赖日本自己的官僚与工业领导，于是，日本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即最早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并被采用的工业化的模式和官僚意识形态开始强有力地复兴。在日本领导手中，占领军最初的改革被修正了、抛弃了或被忽视了。拆散日本工业的政策被悄悄地抛弃了，而反托拉斯的立法（解散财阀）也慢慢地落满灰尘。教育体系重回权力中心，警察部队也一样。左翼的罢工和活动因被认为有碍经济复兴而受到压制。那些在战后不久受到清洗的高层官僚又被恢复在政府中任职。在麦克阿瑟自己的首肯之下，军队也建立起来了，因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³

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领导层参与到强有力的“建制”中^①。这时，该领导层潜伏在那些关键的机构里，这些机构包括经济企划厅、财务省、经济产业省、日本银行以及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等，它委派企业代表与政府一道制定长期的规划。在政治上，这一领导层被整合进一个名

① 参见两本最近出版的书：Nathaniel B. Thayer, *How the Conservatives Rule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和 Haruhiro Fukui, *Party in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为自由民主党的联盟,该党成立于1955年,这样战前的两个保守政党就携起手来。自民党一直在国会中保持多数席位,并且因此反过来又控制了内阁,这个政党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它完全熟悉如何在战略上操纵政治庇护及讨好选民。

但是,正是这一领导层对政策的支持以及对大家共同拥有的工业化意识形态的支持使其变得非常强大且带有一种韧性。从一开始,人们就完全认同通过储蓄以及不借外债,资本将从国家内部生产出来。节约出来的资本将用来创造出更多的资本,并将被投放到经过仔细遴选的经济目标上,而不是在国家内部平分。虽然人们被允诺所有人都将得到更好的经济福祉,但是,很明显的是,某些经济部门将得到明确的优待。所得税计划非常落后,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可以用来抵税。消费税的征收对象既包括清酒和糖,同时也包括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直接工资一直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而福利则以各种间接方式发放,比如通过奖金、住房津贴、交通补贴以及健康保险等——所有这些办法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资本投资以及规范国内的消费水平。在“产业合理化”的名义下,那些达到或超过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企业得到日本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大型跨地区银行的贷款倾斜政策的支持。最后,作为不从外国借入资本的一个重要措施,国家领导主张日本应该实现粮食自给以尽可能少地将外汇花在进口食物上。为了实现这一点,全年收获的稻米都将以一个保护性的价格销售,以这种方式来刺激稻米的生产(在最近这些年保持在盈余的水平)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贸易结构的效率。日本产业复兴的各种政策,包括经济增长的数字与事实经常出现在西方语言出版物的叙述里,在此就不讨论其细节了^①。

在这样一个持续的政策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共识,那就

^① 参见 Kozo Yamamura, *Economic Policy on Postwar Japan*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

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应该予以关注的“官僚主义”。这一共识，常常比意识形态显得拥有更多的锐气和相互尊重。这里面共同经历也在发挥着纽带的作用。这些“建制”的成员通常毕业于同一所重要的大学。他们每个人都通过了教育系统和考试程序用以选拔人才的各种严格的关卡——“考试地狱”，日本学生提到它时通常会痛苦地这么说。通过接受相同的理论上的、技术上的以及实践上的训练，他们非常清楚各自的能力，这也加强了这群精英的锐气。但是，这一锐气也导致他们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预设。

这是一种成功的伦理，一种竞争性的苦行的伦理，它首先既是平均主义的也是精英主义的。它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非常明显该机会是通过教育提供的），但只有那些非常优秀的才能胜出。高等教育、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位置或者简而言之保持国家福祉与尊严的任务将委托给那些成功者。这种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感经常被说成是“封建家长作风”的残余，实际它也确实是这样。然而，它背后的心理却非常复杂，⁵并且最好把它当成对国家未来的一种官僚主义式的愿景，这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自信，尽管出现了短期的挫折，但官僚体制将会作为国家至关重要的基础而存留下来。理性的官僚治理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被确定为日本历史发展的中心，而且这一假设被当作核心政治现实而被投射进日本的未来。这样，受到称颂的就是1868年明治维新的官僚和管理的传统，而不是人们在封建历史中能够找到的个人的或具有领袖魅力的“仁”。通过官僚集体的专业知识，得到强调的是保持国家整体性的观点。

在日本的官僚体制中，对于社会和国家独立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明显在发挥着作用。它是一个朴素的但又有说服力的看法，深深扎根于日本的历史，并使这个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力量——富国——就确保了独立。虽然其在战前的刺耳言论被剥夺了，但统治阶层对这一经济官僚主义的信心依然不曾动摇。因此在日本，官僚服务并不仅仅是一个享有声望的

职业或是一条通往积累大量个人财富的途径,它还是一项“使命”,即通过系统地创造工业财富来提高国家的福祉。

然而,今天的日本,一个吸引人的侧面却是尽管存在献身这一使命以及人们对该使命的重要性的认识,人们依然一直对其怀有一种强有力的补偿性的态度。人们相信官僚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国家整体的精神需要、知识需要或维持自身存在的需要无关,它只不过是精英的内部事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精英们自己的利益。社会的大多数均与官僚制的框架保持着合乎道德的距离,并且人们对于企业和政府的领导者还存在着一种相当强烈的矛盾心理。虽然人们通常承认如若没有该领导层,经济复苏是不可想象的,但人们在感情上明显缺乏对于领导层的忠诚。

- 6 在这种对于官僚主义的戒心之上是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相信人性的灵魂在根本上是纯洁而真实的。正是这种理想本身或者说“文化之魂”确立了日本人赋予人性(人间性)的深层价值,它劝说人们去创造并对他人的行为采取批判的行动。这一理想主义的语言发源于封建制的过去,对于被称为“维新主义(restorationism)”的激进的抗议模式来说,它将作为一种关键的组成部分而被讨论。

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天皇机构在这一伦理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法律权力的终极源泉,它批准了工业革命,但是作为日本文化史的绵延不断的象征,它又代表着为国家共同体纯粹而又无私地献身的原则。首先,作为天皇,他代表一种文化理想,这加强了普通人把自己转变成超人的能力,也充分唤起了蕴含在普通人自我中的活跃的、创造性的潜力。对这一理想的认同有时会导致一种果断的反现实的行为,并且还会用维护整个社会的帝国正义的想象和修辞来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毫无疑问,天皇的这种整合能力在战争中遭受到了不可修复的破坏。由于历史环境,天皇迫不得已承担了整个国家在战败中的悲痛,并随后公开否认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虽然文化理想主义在战前所拥有的激进特性已经不再那么明显，它依然在现实中存活了下来。在普通的社会交往中，在经常被讨论的“义理”关系中最能够看到这种文化理想。在其理想的场景中，义理是一种人的责任感，当人们对另一个人给予自己的纯粹的祝福做出回应时就会或应该感觉到。这一报答被理解为纯粹的且没有私心的，就像是从人的灵魂的自我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一样。实际上，它暗示一个人很少会让步或放弃自己的一切。这样，一个友善的行为引来互惠的或者作为交换物的对行为者本人合理保留自我利益的承认，虽然这一关系未必是完全对等的。还有非常清楚的就是义理关系中的基本的伦理合法性是直接传统中关于真实的人的感的理想观念中提取出来的。

7

然而，现在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日本的理想主义，不管它是如何被定义的，正在受到不断扩张着的官僚主义的直接威胁。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战后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工业复兴，它将这个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陷入饥饿边缘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差不多还有同样多的人认为“自由”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是，他们接受了这一被重新定义的天皇的形式。而且，在1970年，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在精神上比战前的那一代人更快乐，尽管经济比那时繁荣，政治比那时民主。很多人认为战后时代唯一的最重要的“损失”是“人的心灵”（心）的丢失，并且，他们希望未来的成就将能够在日本社会中恢复“慈悲心”或者一种“人性”（人间性）的感觉^①。

这种人们表达出来的遗憾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田园诗般的过去的渴望，而代表着一种去实现某些新的，不同于那些被过去的灾难所认同的价值观的愿望。尽管如此，刚刚提到的民意测验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态度只是强调了日本人关于自己的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尽管不再试

^① 该民意测验结果刊登于1970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上。

图使战前的天皇主义复生,但日本人依然是非常热情并且感性的人。随着新工业化正在成为已经实现了的事实,人们越来越关注更深层次的心灵需求,而所有人都认为官僚主义是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的。

在最近的这些年,举例来说,人们对历史又发生了新的兴趣。传统的意义再一次被讨论,只是和战争刚结束的时期相比少了很多咒骂。出现了大量的书籍讨论义理、美、宗教信仰和共同体纽带等基本文化价值。关于近世的历史小说非常流行,而且其中的一些还被巧妙地改编成连续剧在电视上播放。一本畅销书在更宽广的历史框架中重新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将之称为“亚洲的第一次百年战争”。而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告诫他的读者,由于过于注重经济增长,日本“人民”已经衰颓,成为一群难以辨识的“群氓”,完全失去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和具有创造力的民族精神^①。

尽管有前面这些讨论,如果我们把对官僚主义的怀疑仅仅看成是传统理想主义的复活,那将是错误的。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出现了一种表达清晰的对新的民主大众运动的吁求,这一运动试图继续完成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启蒙”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大众政府的努力所未竟的事业。意识到历史上之前的失败,这一运动将其破除迷信的对象指向“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所有那些曾经阻碍日本真正实现现代化的观点与概念。带着异乎寻常的活力与口才,丸山真男在他的著作中指出^②,之所以那些过去无法实现的现在都实现了,是由于存在着人民主权、普选权、公民自由以及一部剥夺了战争权的宪法。通过对过去的系统性的约束而清除了前进的障碍,国家可以朝着日

① 三岛的观点在他和林房雄的《对话:日本人论》中有着清晰的表述(东京,番町书房,1966)。有兴趣者可以参照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2卷(东京,番町书房,1964—1965),关于义理和日本心理的文章参见源了圆《义理と人情》(东京,中央公论社,1969),以及南博《日本人の心理》(东京,岩波书店1953),该书至少重印了23次。

② 丸山真男的部分文章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刊登于Ivan Morris编辑的*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一书中(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

本精神的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在当代日本思想史中是个很少见的时期,大多数人,不管他们属于战前一代还是战后一代,甚至包括激进的左派、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进步的自由派都带着一种破除旧习的团体精神以及对战后发生的民主运动的乐观精神。

这一乐观精神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制订了民主宪法,其中的权力结构显现出更多的战前政治的特征而非战败后新设想出来的民主的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宪法能够以明显非民主的方式被用来巩固工业复兴政策,而且战后的官僚和工业精英能够非常有效并舒服地在这一秩序中操纵一切,并且指引民众参与到经济扩张的过程中。而且,针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保守势力的联盟预设了一种政治方案,在该方案中,自由民主党将控制国会以及选举过程。该党实际一直持续控制着国家政治,在国会中保持着“永久的”多数席位并把社会主义者持续压制在少数派上^①。

尽管存在这些强有力的潮流,民主的价值观在当代日本依然非常重要。理性人道主义抽象的价值规范所发挥的作用就像是既有政治与历史之外的一个参照点。在这方面,民主在日本是一个激进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关于政治进程的实用主义的概念。民主提供了一个道德身份,并以这个身份去批评历史潮流以及当代的文化及政治内涵。正如在战前的20世纪20年代,对于宪政政体来说,民主并不是一个得到授权的意识形态,相反却是批判性的而且经常是反传统政治的。

作为20世纪50年代在道德预期与不断扩展的有组织的政治进程之间存在的明显的鸿沟,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现它自身在何种抗议策略更为恰当这一问题上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大学生,他们迫使激进分子与官僚政府的军队发生冲突。很大一部分人离开那些提倡温和

^① 这种状况似乎将在未来的一两年里有所改观。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东京、大阪和京都市长的位置,这表明他们在中心城市的势力有所加强。